



典藏諾貝爾 06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COBEL

而且正在我們城市中展開...

這條窄徑是恐怖的，

都要跟著米契爾所起頭的窄徑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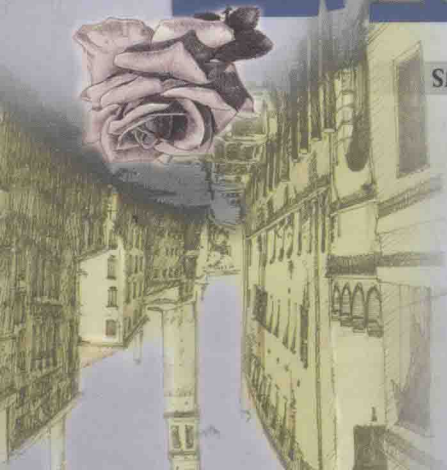
其實他們錯了。不久以後，我們的市民，無論窮富，

習慣性使人們認為像那種倒楣的事是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

黑死病

ALBERT CAM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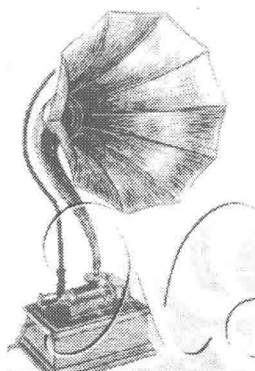
卡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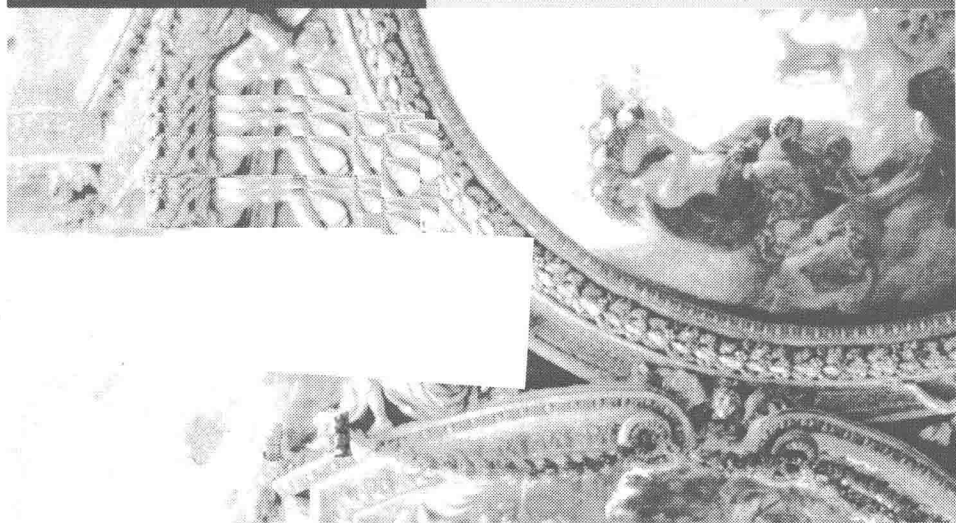
卡繆の

ALBERT CAMUS

黒死病



NOBEL



典藏諾貝爾 06

卡繆の黑死病

環華百科出版社・環華館

出版者◇環華館

發行者◇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物流編號◇DAAF

編譯◇諾貝爾文學編譯委員會

文字編輯◇黃鈺茹

美術設計◇文雪・昭茵

ISBN◇957-459-632-X

◎發行總代理：

兒童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TEL◇(02) 2388-2933 (代表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9號

◎實體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TEL◇(02) 2242-1566

FAX◇(02) 2242-2922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3號4樓

郵撥帳號◇19220588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線上總經銷：

網路書店◇www.book4u.com.tw 華文網路書店

電子書◇www.book4u.com.tw 華文電子書中心

郵撥帳號◇19459863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門市◇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卡繆—黑死病／卡繆著；諾貝爾文學編譯委員會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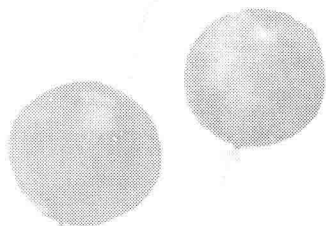
臺北市：華文網，民91

面； 公分

ISBN 957-459-632-X（精裝）

876.57

91010580



前言——關於卡繆

在戰後的法國文人中，卡繆是唯一能在能力上和聲譽上與沙特相較的。一如沙特，他也是德國占領軍撤退後成名的抗德知識分子；一如沙特，透過報紙雜誌上的文章和出書，他對某一部分的法國輿論，有可觀的影響；一如沙特，他也熟知突然而來的聲名與榮譽的甘苦。有一陣子，他們的名字經常都是相提並論，好像那些雙生的神祇。然而，在近幾年，沙特和卡繆卻走向相反的方向。這個發展，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期「現代」雜誌（沙特主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那上面發表他們彼此間的信件，或者說得更正確點，是彼此間的侮辱。這件不幸的事情實在是可以避免的。然而這件事比他們早期的聯盟看來更自然，因為儘管沙特第一本小說「嘔吐」和卡繆第一本小說「異鄉人」有某種血緣上的相似，但是從來再沒有比這兩個人在脾氣上、背景上和在一般的看法上，更為相對的。

沙特這巴黎人，是一位老派的哲學教授，不過，他使生活服膺於觀念的訣竅卻是極不學院派的。作為一位小說家他的視野是寬闊和多變的；然而他對現實的看法仍是以「心靈」和「存在」作為兩個固定的核心。因此，他可被視為一個直系的，

即使是疏遠的，笛卡兒的後人。卡繆這北非人也學過哲學，但他並不是將它作為一種知性的規律，而是將之看成一種感性的表現形式。他作為一位小說家的範疇遠比沙特為窄；他的批評卻是更為直接的。卡繆的確是被巴斯噶所說過的那種內在的理性準則所導引的——這些理性準則直接與邏輯及經驗對抗，與其說是理性的，不如說是熱情的呼喊。

在這裏，我們便看到卡繆作品中的基本主題：艱辛地抗議人在宇宙中地位的不公平，同時並對隨之而來倫理上的難題作一個檢視。即使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卡繆也本能地排拒非道德的看法——這些看法，看來會是他對人類存在荒謬感的自然產品。在一開始，他就為他那根深柢固的倫理上的信念，作為追尋某種知性的基礎。

在他的早年作品中——他的第一本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第一本論文「薛西弗斯神話」（一九四二），首兩部戲劇「誤會」（一九四四）和「卡里古拉」（一九四五年出版，作於戰前）——卡繆就寫下他的難題的性質，藉著一種「荒謬」哲學，展示出存在的某種形式的非人結果。

在他第二本小說「黑死病」（一九四七），第二本論文「反叛者」（一九五一），後期的戲劇「戒嚴令」（一九四八）和「守法者」（一九四九），他試圖解決這個衝突，進而建立一個更肯定性的倫理系統。卡繆早年作品所暗示的道德範疇是人類越

過後會失去一切人性的，在這裏，這個道德範疇是更為明顯地寫出來。卡繆在「薛西弗斯神話」中將人類的難題形容為荒謬感的一種形式，他的第三本小說「墮落」（一九五六），對人類的難題進行探討並作出熱情的指摘。

事實上，這個發展只發生在卡繆的個人情感中，並沒有注入他對世界的基本看法裏。他對人類存在的荒謬感和他的倫理學是植基在對現存宇宙結構的一項反叛行為中，而對於一位獨特的不可知論者（agnostic），這兩點都是專橫的。卡繆如果單是要告訴我們，道德價值不能建築在實用的事實上，政治權利也不能建築在政治力量上，那麼去接受他的觀點倒也不難。但他看來卻像是在告訴我們，道德價值和實用的事實是矛盾的，政治上的道德和政治上的效用是矛盾的。換句話說，他不是要假設一個非道德的，而是要假設一個直接反道德的宇宙——一個高度神人同性的異教神類——作為適當的反叛對象。向盲目、沒有生命的事物揮舞我們的拳頭是沒有用的。

「薛西弗斯神話」和「反叛者」所寫下的全部論辯幾乎會引起反駁。然而，撇開那些錯誤的推理和現實主義的欠缺，在本能上我們知道卡繆所要說的是：我們內在那位永恆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現代科學所揭示的宇宙。雖然人類習慣為物質上的充裕和物質上的力量所吸引，人類仍然保有一個很大的偏見——是這麼有力地

繆所有的作品中表現出來——那就是同情犧牲者、失敗者、和在失敗的一方作戰的人。這是我們唯一能和整個事實對抗的行動。

這種抗議的行為在基督教中是有一點存在的，雖然篤信基督教上帝的絕對公正使得它減弱了。卡繆對人生的一般態度，就好比一個信仰非基督教上帝的基督教徒。然而這卻是一個宗教的人生態度。情感先來，其次才是對情感的知性合理化，好比卡繆的兩部小說「異鄉人」和「黑死病」，比與之有關的兩本論文要出現得早。在這兩部寓言中，卡繆所說的是一種個人的宗教，他繼之努力將他的宗教用邏輯的演繹法建築起來，使之成為一種行為上的實用法則，他並努力「證明」它是可行的，而他的小說比論文顯然更具說服力。

「異鄉人」是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故事是講一個年輕人與他的社會格格不入。這並不是有意的反叛。像一個小孩，莫魯梭在不同的社會處境下，全然不曉得作出社會所要求於他的情感反映。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母親的喪禮中，他是被期待要表現一下某些情感的；他也不知道在母親喪禮後，要過一段相當的時間，才可以和一個女孩子發生關係；他也不知道要告訴這女孩子他愛她，雖然他只是要和她做愛；他也不知道如何在公司裏表示急於升遷。

心理學家無疑會對莫魯梭對生活的漠然給予一個名稱。然而卡繆小說裏的枯乾

和不協調的幽默是針對社會而發，而不是針對他的主角的。莫魯梭內心的結構，將他看到的四周生活的零碎細節記錄下來；然後檢視這些細節的一般解釋以及這些細節間的一般關係。這個觀點反映在卡繆的敘述風格上便是簡短、不連貫、純粹描寫的句子。而讀者一旦熟識了莫魯梭的單軌心靈，就開始懷疑，這些解釋與關係是否只是專橫的傳統，設計來使邏輯具有表面的掩飾，使人類存在的不可解的事實看來熟悉。

這些傳統不管是多麼沒有根據，也有某種存在的價值，而社會一旦遇到莫魯梭這樣危險的敵人，是應該加以防禦的。在小說發展到一半時，由於一系列高度非理性的情境——莫魯梭被動的「友誼」，和一個可疑的人物牽涉入一些阿拉伯人的紛爭，他同樣被動地默許去沙灘度過一天的計畫，無情的正午太陽的影響——莫魯梭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事情是很明白的，然而判決的輕重主要在於這兇殺究竟有沒有預謀。讀者都很明白，這兇殺並沒有預謀。然而，當陪審團知道莫魯梭在母親的喪禮中和喪禮後的行為，檢察官很容易就使他被判死刑。莫魯梭既在法庭上架構起來的罪行，與先前的行為之間找不到任何關聯，在這時候便以一個外來觀察者的冷漠好奇來聽審。他離開法庭時，覺得他的被判死刑，只是因為他在母親喪禮中沒有表達出適當的情感來。

在他的審訊和被判後——這是一個具體的象徵，象徵著我們都被判決了專橫的、沒有意義的死亡——莫魯校才完全感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基本荒謬性。他對社會形式的困擾不了解，此刻變成自覺的反叛。在他經歷的法律程序中，他體認到一個具體的象徵——我們都被判決了專橫的、沒有意義的死亡。這個最終的啓示，也使他自覺到對現存世界外在的連帶責任感。而卡繆的小說並沒有結束在莫魯校的意識到荒謬感這個否定面，而是在他肯定性地體認到他過去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一切人間的快樂。「好像有一大股憤怒爆發出來洗淨我的罪惡、剝削我一切的希望，而第一次，我在佈滿星座和星星的夜裏，無遮地躺著，迎受宇宙的仁慈。感到宇宙和我自己這麼相似，和我這麼親近，我感到我過去是快樂的，現在也是快樂的。」

卡繆的第二本小說「黑死病」是講一個現代城市奧蘭被黑死病所折磨，這本小說比較長也比較複雜，它的敘述者雷克斯醫生是重要人物之一，但他的身分一直到小說最後幾頁才揭露出來。雷克斯醫生慣於用第三人稱來講他自己，當描述黑死病的整個影響時則用雙數的第一人稱。無疑，卡繆是想結合一個旁觀者的客觀性和一個當事人的內在了解。整體來說這技巧是成功的，雖然這是部由一個無名但卻是無所不知的敘述者講述的小說，有時變得有點不自然。

小說的主題重心是一個城市被不可預見的災禍暫時與文明斷絕。小說的結構是

跟隨著黑死病的過程，從它的開始到最終的消失，敘述者非常細膩地講出奧蘭城居民所受到的外在的及道德上的影響。

「異鄉人」和「黑死病」的嚴酷的事件——莫魯梭的審訊和判決、奧蘭瘟疫所造成的專橫的集體謀殺——顯然是一個更為宇宙性的人類命運的象徵。其他當代的作家也曾經用過它們。「異鄉人」可以和卡夫卡的「審判」相比，而卡繆在安東尼·聖達德的文章Le Theatre Son Double及狄福的「黑死病一年的日記」找到黑死病的象徵。不管他受到甚麼文學的刺激，這些象徵是緊結合著卡繆的個人生活經驗的，而他對它們的運用也完全是他個人的。死刑的主題曾吸引過不少小說家，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斯湯達爾、雨果、和巴爾扎克，但對卡繆，卻可追溯到他兒時聽他母親講述他父親執行的一次死刑，他所受的震驚。這個震驚對卡繆後來思想發展的影響，可以從「黑死病」中塔魯說他自己道德上的危機來自對死刑的震驚這裏看出來。此外，在細節和在較大的含意上，卡繆對黑死病這個象徵的鋪張，是根據德軍占領法國時更為普遍化的震驚而來的。

卡繆的另一特色是，這些象徵在小說中的可信性，並不是來自卡夫卡的事實與幻想的夢魘般混合，而是來自將它們當作客觀事件細緻地作新聞式的報導。在「審判」中，我們感到一個嚇人的夢的陰險力量；在「異鄉人」中，我們感到的是一個

外在物體的抗拒。雖然卡繆的象徵是相對於所有古老的表現上天的不公平的意象，它們同時也是痛苦地被視為人間的事件。如果我們對自然之能模倣現代官僚政治的冷血程序感到震驚，那麼對人類社會的模倣自然的「不人道的律例」應當只會更為震驚。相反的，我們難道不應該盡我們所能做到的去斥責、去抗拒、去盡量減輕這些自然律例的工作嗎？

前一個看法開啓了卡繆對「荒謬」的自覺：他相信既然人終究要死，人的存在是全然無意義的。後一個看法提供了卡繆的倫理信念基礎：他相信人只要一起去抗拒一項公認的邪惡，即使他們打的是一場敗仗，也能使他們的生命有一點意義，並建立起一個人對社會的連帶責任感。

卡繆的荒謬哲學在「異鄉人」最為明顯；他的倫理信念在「黑死病」則最為明顯。雖然它們引導出相反的結論，二者卻是緊密地聯結著的。在「異鄉人」，人間的公道象徵指向宇宙中上天的不公；在卡繆的第二本小說，上天的不公（「黑死病」）指向現代戰爭的專橫的、大型的殺戮。不論在任何一本小說中，我們都不能將卡繆的象徵與他要表達的意義分開來。卡繆眼中的外在宇宙含有一種幾乎是屬於人的惡意；而人類社會卻含有物質力量的漠然。

自然的和社會罪惡的象徵結合、形而上的和道德難題的象徵結合，造成卡繆小

說裏某種曖昧的元素。舉例來說，為甚麼我們對莫魯梭無理性地殺死那個阿拉伯人感到漠然，而對他的被判死刑反應強烈？當然，莫魯梭沒有預謀的兇殺是不公平地被控訴的，但如果摸清卡繆思想中反法律的部分，那就知道這種被控只是技術上的問題。這本小說沒有能夠把他的荒謬哲學「就宇宙基本上的不公平來說，「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收容許的」和倫理信念之間的矛盾融合起來。

在「黑死病」中，這個矛盾被撇開了，然而我們卻指控卡繆逃避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黑死病的發生及其道德影響——檢疫封鎖、隔離、配合、黑市買賣、恐怖、焦慮、與煩悶——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起德軍占領下的法國。然而卡繆卻以抽象的罪惡來代替有血有肉的敵人；雖然黑死病具有幾乎是屬於人的邪惡，它沒有引起道德上的困擾。主要的「也許是痛苦的」問題就是塔魯所提出的。塔魯基於他曾經參加革命行動的經驗，問道：以暴抗暴是不是合法的；答案雖然有點簡單，卻是說不出的。然而這個問題從未在卡繆的小說中出現過。雖然塔魯所敘述他的革命經驗，似是用來解釋黑死病這個中心象徵，卻不能和黑死病所造成的情勢相吻合。

假如卡繆的小說是和實際的政治或社會組織的難題有關，這些異議就會有相當分量。然而，它們卻應該被解釋為人類基本反動的表現，這個反動並不是針對暴力本身，而是針對集體暴力的冷血、理性的組織——卡繆認為這是宇宙的外在結構所

具有的，也是現代國家所藏有的性質。在卡繆看來，自然和社會都同樣是邪惡的；兩者當然都是強有力的；而兩者都向它們的子民強求某種邪惡的盲目崇拜。卡繆所要反的，正是這種物質力量在精神上的假裝神聖，以及附著其上的無知和謬想。就他們職位上的權力而言，牧師和法官在道德上是平等的；這是卡繆小說中一對學生的主角。

從這方面看來，「異鄉人」和「黑死病」之間的對照，被卡繆和安德烈·馬爾侯（驟然看下，他是會使人拿來與卡繆比照的）之間的對照所遮掩了。卡繆和馬爾侯都是服膺於感性多於知性的。尤有甚者，馬爾侯的影子可以在「薛西弗斯神話」某些地方清楚地看到。在這裏卡繆有點念念不忘馬爾侯的主角們某些英雄的無畏態度。然而卡繆的小說看來不單是倚靠這個文學上的影響，而是與之敵對。問題並不在於提昇自己、發現某些「絕對」來對付死亡及毀滅。而是要正視這些敵人並窮追不捨。如塔魯所說：「盡一切可能來擺脫黑死病……這是唯一能使人不耽憂的，如果這也不能拯救他們，起碼它可以讓他們盡量減少做壞事，有時甚至做好事。」

「薛西弗斯神話」和「反叛者」在某些方面，與馬爾侯相較另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卡繆並不是說，這個針對現存的宇宙結構知性的和道德的掙扎是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標。卡繆的思想肯定面是藏在生命本身的肯定因素，藏在偶爾人間的快樂，

而不管這是多麼短暫，多麼受到威脅，也是人存在的一面，是和象徵性的黑死病一樣真實和重要的。在「薛西弗斯神話」的結論中他寫道：「向山頂推石前進的掙扎就足夠充實人的心靈了。我們想像中的薛西弗斯是一定要快樂的。」但在莫魯梭最後發覺自己是快樂時，在雷克斯醫生與塔魯夜泳發覺兩人「都充滿著奇異的快樂」時，快樂的觀念並不純然是從想像中而來的。

這種個人快樂問題顯然具有倫理學的含意。但在「黑死病」（在報紙上常常不是這樣的），卡繆普遍都小心地避開說教。有一種道德家熱心地追求大眾的利益，聲稱為絕大多數人追求最大的利益，他們往往在過程中忘卻所牽涉到卑微的個人，和這種道德家大不相同，卡繆並沒有指出，集體的努力要比個人私人的努力來得更

好。

卡繆的敘述者雷克斯醫生，對一個被困奧蘭而試圖越過封鎖去重會情婦的巴黎記者表示出某一種程度的同情。當然，這個記者終於決定在奧蘭留下來，幫助抵抗黑死病，但他的決定並沒有抹掉他先前的評語的重要性：「對我來說，我見過太多的人為一項觀念而死的。我並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這是容易的，而我也學到它是謀殺性的。我所感興趣的是為所愛而生，為所愛而死。」即使最關心道德問題的塔魯也承認：「當然一個人要為弱者而奮鬥。然而，如果在另一方面，他已經停止

去受甚麼事物，那他的奮鬥又有甚麼用呢？」

這樣看來，奧蘭城居民的規律、犧牲，甚至偶然的英雄主義，和當地政府加諸他們的微瑣的條文並無二致。這一切只是必需用來（整個來說也是討厭的）達至所希冀的結局的途徑：使世間人類的受苦減輕。

這和自「征服者」（馬爾侯的小說）出版後的法國小說的態度和意願是相當不同的。在今日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又怎麼可能單單去想及個人的快樂呢？所謂個人的快樂只是另一劑「布爾喬亞」的麻醉劑，人唯一所有的滿足，只是抗議他那無可挽救的困境。整個來說，這是三四十年代小說家的訊息。

如果卡繆曾經將個人的快樂這個主題復活，擺脫它所受到的傳統和習慣的桎梏，使我們感到它對心靈的不斷衝擊力，這並不是因為他對這個主題有甚麼錯覺。而也許是卡繆（法國著名的小說家中少數對貧窮有真正認識的）對阻礙追求個人快樂的障礙物有特別親切的經驗。除了從未重印過早期的「銀幣的兩面」（一九三七），卡繆很少直接提到這些個人的經驗。然而，它們使他能夠敏銳地感到某種形式的人間痛苦，更使他深深厭惡任何以某些崇高的價值來抬高或將這些痛苦合理化的企圖——不管是將之歸為神的意願，或對某些政治教條的信仰，或者是相信為某些集體目標而犧牲生命，可以提昇他們個人的及肉體的拘限。

但不管是被判死刑後的莫魯梭，或是被黑死病侵襲後的奧蘭居民，對人類存有的潛在悲劇的一切了解，使人敏銳而痛苦地領會到他與他所居住的世界片段的聯繫。這就是卡繆稱為的「銀幣的另一面」。卡繆感性的抒情元素，大多是來自早期一冊「婚禮」的文集（一九三八）。在小說中，這種抒情元素被侷限著，並被卡繆嚴肅地一再描寫世界殘酷的漠然所引領，而卡繆覺得他和這世界是緊密地聯結著的。這種抒情元素卻一直保持著。卡繆作品中特別的調和並不來自冷硬的明朗性，也不來自潛藏的感性，而是在二者之間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卡繆的小說分別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和奧蘭，他對兩個城市的看法，是親切、同情、輕蔑和恐懼的奇怪混合；蕭瑟和荒涼、平凡和不吸引人，這些現代的沙漠都市，全然沒有人造美、自然、歷史，看起來就像是象徵著廿世紀心靈令人窒息的監獄。也許這就是它們特別吸引卡繆的地方吧！如果奧蘭的空白、毫無表情的石頭並不提供他任何希望，它們更不提供他任何幻象和錯覺。在這裏，我們終於可以找到孤獨——這種孤獨，一如卡繆曾說過的，使每一樣事物都有其價值。然後還有「銀幣的另一面」——圍繞在周圍的乾燥群山和閃亮的海灘所造成的郊野，它們和城市是隔離得這麼遠，以致它具有天然般的豐美。城市窒息性的限制和海洋突然開放之間的基本對稱，藉著冷酷、非人的日間與黑夜及黃昏微風的